

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经典

——略论陶渊明园林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龚 斌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魏晋时期士人园林兴起,陶渊明的园林以其自然朴素、充满隐逸情怀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经典。陶渊明结庐人境,从自然中发现美、书写美。赞美国田居的宁静与自由,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陶渊明的园林以隐逸之志为内核,以鄙夷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林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后世士人园林深受陶渊明的影响,继承了前者的写意特征,以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关键词:魏晋士人园林;陶渊明田园居;后世园林;清高与闲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1-0083-14

一、魏晋时期的私家园林

中国园林源远流长。中国园林史著作一般认为,《诗·大雅·灵台》一篇是最早记录中国园林的可靠文献。^①毛诗序和郑玄笺都说是周文王受命,作邑于丰,立灵台。^②至秦汉时期,皇家园林至于极盛。园囿之辽阔,建筑之奢华,飞禽走兽众多,佳树名花遍野,无不空前绝后。读《三辅黄图》及司马相如《上林赋》等宫苑大赋,大体能了解当时皇家园囿的恢弘气势以及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东汉后期,由于社会政治黑暗、思想解放、人的自身意识觉醒,个性得到尊重并张扬,加上自然山水美感的进一步发展,一些仕途不得志士人,有意疏离不堪的现实政治;或有性喜山水鱼鸟之人,向往优游自在的生活环境。由此,私家园林渐渐兴起。其中,仲长统是一代表人物,在中国园林史上很有影响。他以为帝帝王者不过是想立身扬名,但名不常存,人生易

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蹢躅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③

仲长统勾画的园林图景,应该是中国士人最早的园林蓝图。这幅蓝图的旨趣是“优游偃仰,可

收稿日期:2019-11-21

作者简介:龚斌,男,上海崇明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选择自然环境清旷之地,优游闲居,自由自在,娱目赏心,逍遥一世。园林的要素如下:一是良田广宅;二是背山临流,置于山水之间;三是沟池环币,竹木周布,景致优美;四是前有场圃,后有果园,经人工的治理,宜于家居;五是物质丰富,不须劳苦;六是有良朋,有美酒佳肴;七是游览山水之乐;八有静思养生之道;九是论道讲书,评论人物;十是“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有歌舞之乐。真所谓十全十美!既有山水之乐,又有口腹之乐、琴书之乐,物质与精神的种种享受,无不惬意。显然,仲长统理想中的园林,并非一般士人所可梦想。它代表了权贵和豪富的人生理想与审美趣味。虽然有背山临流的良田广宅,有竹木周布的优美景致,但终究有浓厚的富贵气,缺少高韵与雅趣。

汉末政治、社会、哲学、经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直接影响到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和变化。魏晋时期的皇家园林与秦汉相比,不啻小溪之与江海,简直可以略而不谈。但私家园林却得到蓬勃发展的良机。从前,仲长统描绘的园林蓝图,只不过是理想中的士人园林,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事实上,仲长统虽然鄙视“游帝王者”,似乎很看淡俗世的虚名,而看重现世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受,但他本人后来还是做了曹操的幕僚,并非以隐士名世。魏晋时期的文化与时会风气,源于汉末且变本加厉。以《庄》《老》为核心的自然哲学很大程度上打碎了束缚人性的桎梏,尊重人性及思想解放成为引领时代文化的两面大旗。同时,山水美感的普遍认同以及隐逸风气的盛行,都促使士人园林的勃兴。

最早的魏晋士人园林当推西晋石崇的私家园林金谷园。石崇《金谷诗叙》说:

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

不必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④

读《金谷诗叙》,可以了解金谷园所包含的园林文化的基本内容。《金谷诗叙》说金谷别业“或高或下”,是指别业依山势而建。郭缘生《述征记》写他所见的金谷园说:“石崇因即川阜而制园观。”^⑤因地制宜,随地势之高下建筑园林,成为以后建造园林的圭臬。金谷别业环境极佳,有清泉茂林,各种植物毕备。石崇《思归引》说,有柏木几于万株。潘岳《金谷集作诗》描写金谷园中“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桕。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⑥,又有水碓、鱼池、土窟等生产、生活用具。“昼夜游宴,屡迁其坐”,以见别业占地之广。“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写宾主游观山水。“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是说边游观边听音乐,极耳目之娱。石崇《思归引》自称“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可见石崇家有伎乐。后面写文士们“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金谷园是两晋士人园林的杰构,既有天然山水之美,又有人工营造之丽。其中最具有文化意义者,在于游观山水、音乐、酒、诗此四者相融为一,成为士人园林的基本文化要素。四者之中,游观山水即山水美的欣赏是第一位的。士人园林的兴起,与自然山水美的发现并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最根本的原因。虽说古人早有乐山乐水之说,但也仅仅是游观而已,尚未有寄身心于山水之间的深切愿望与获得的莫名感动。魏晋时期就不一样了,游观山水美景,欣赏鱼鸟之乐,以至寄形于山水,栖神于自然。例如建安文学作品就有很多游观自然景色的描写。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写春日出游:“从者

鸣笛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曹植《公燕诗》说:“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游观赋》说:“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而自娱。”……

魏末,阮籍、嵇康等游于竹林,沉醉于自然美景中,以此远离世患。阮籍“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嵇康“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曾作诗说:“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⑦初看似乎都是游山玩水,但竹林七贤与建安作家不同了。后者游观山水纯是娱情,前者走向自然,就有了逃世的意味。而逃世,本身就是士人园林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仲长统不是说过吗,“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笃好林藪,隐遁于山水之间,远离险恶的世俗,“不受当时之责”,始终是历代士人栖身于园林的重要原因。

石崇金谷园中的山水之佳,足可以娱情。但园林若仅有自然景物,如山石、清泉、茂林、鱼鸟,美则美矣,却未必尽善。唯有赋予园林文化与艺术的内涵,园林才会具有高雅的格调和深厚的人文意义,从而成为精神的栖息地。其中,音乐、歌舞、美酒、诗歌,是士人园林不可或缺的要害。仲长统的园林蓝图中,已经有了音乐、美酒,还缺美人与诗。缺美人恐怕是仲长统无财力。畜养歌妓非得家资丰厚,这不是一般士子能办到的。至于诗,汉末的五言诗还在成熟的路上。酒与诗也尚未到互相融合的阶段。

石崇富可敌国,可以建造地盘广大的金谷园,可以畜养许多美妓,完全有能力邀集良朋,把音乐、美妓、歌舞、美酒、诗歌等种种赏心乐事聚于金谷园中。山水、美妓、美酒,三者凑泊,自然就产生诗,于是,园林就有了文化,有了艺术。尤须注意的是,建造园林和观赏园林,其实都是追求心灵宁静与精神寄托。石崇《金谷诗叙》说:“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中怀”谓何?即“感性命之不永,惧

凋落之无期”,抒写生命短促的意识,结果自然是及时行乐。

与石崇同时的潘岳,也建造颇有规模的园林。潘岳在仕途不很得意,退而闲居,在洛水边建造园林。他在《闲居赋》序中说:“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赋文写在天清气朗的佳日,一家人远览王畿,近游园林:“于是席长筵,列孙子,柳垂荫,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赆鲤。或宴于林,或楔于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绿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⑧仕途不得意而退归闲居,造园林以逍遥,享受人生的乐趣,乃是历代士人园林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园林史上,东晋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士人园林迅速发展,一些造园的基本原则深刻影响后世的造园技术及园林文化。据留存的文献资料可知,东晋士人园林有顾辟疆名园。《吴郡志》卷一说:晋辟疆园“池馆林泉之美,号吴中第一”。又有纪瞻“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林木足赏玩焉”^⑨。名士孙绰在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⑩。王羲之、谢安在会稽时,也有园林。《晋书》八〇《王羲之传》说:“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名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羲之《与谢万书》说:“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又说:“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谢安先前居会稽,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往来说

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⑩。后出仕在京师,“又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⑪晋末名士戴颙,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⑫

东晋园林文化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推兰亭雅集。穆帝永和九年(353)暮春(此时距西晋石崇金谷雅集已有六十年了),王羲之、谢安、支遁等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游目骋怀,流觞曲水,咏怀赋诗。显然,兰亭雅集是对金谷雅集的有意识的回应,虽仿效前辈风流,但意义超越前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恒的佳话。山阴兰亭是否王、谢的园林,此事不能确知。王羲之《兰亭集序》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是一处自然景色极佳的游览胜地。兰亭雅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畅叙什么“幽情”?“幽情”即是以下几句:“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刚才游目骋怀之欢欣,转瞬之间,已为陈迹,但仍不能不令人兴怀感叹。何况,人生长短随自然之变化,终归于尽。死生是人生最大的变化,岂不痛哉!意识到万物变化,终不归于空无,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不可避免。这与《金谷诗叙》“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感叹若合符契。

最后说谢灵运的山居。魏晋士人园林的冠冕应该是晋末宋初谢灵运的山居。即使石崇金谷园与之相比,亦不啻小溪之与江河。灵运出身东晋著名望族谢氏,曾祖谢安未出仕前就已经营东山别业。父祖并葬始宁县,有故宅及墅。灵运移籍会稽,在祖居旧宅的基础上开疆拓土,依山傍流,种竹、植树、栽花、建馆,营造巨大的园林。他的《山居赋》详细描写山居的形胜及花木、鸟兽、禽鱼之繁。“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山居四面有山有水。自

注:“葺室在宅里山之东麓,东窗瞩田,兼见江山之美。”灵运信佛,建经堂、筑讲堂、立禅室、列僧房。又说:“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自注:“两居谓南北两处,各有居止。峰崿阻绝,水道通耳。”南山居处的地域之广,见于自注:“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涂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岵弥阜,横波疎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及至所居之处,自西山开道,迄于东山二里有余,南悉连岭迭郭,青翠相接。云烟霄路,殆无倪际……南山相对,皆有崖岩,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倾柯盘石,被隩映渚。西岩带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浚壑。去岩半岭,复有一楼,迥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径。从北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备尽之矣。刊剪开筑,此焉居处,细趣密玩,非可具记,故较言大势耳。”从作者的这段自注,可见灵运山居景色之美,莫不必备,难以殚述。生活舒适及游目骋怀自不待言,精神的追求也孜孜不倦。一是采药消病以求长生:“寻名山之奇药,越灵波而憩辕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二是奉佛:“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既响,颂偈清发……”三是读各种经典:“见柱下之经二,覩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四是吟诗作赋:“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历代描写园林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谢灵运《山居赋》那样的具体详细。

谢灵运的山居,堪称魏晋士人园林的极致。在中国园林史上,规模如此恢弘、景色如此优美

的士人园林也难得一见。一般的官僚和普通的士人因财力有限,绝无可能建造这么大的园林。因此,谢灵运的山居不可能复制,其实不具有典型性。

从以上魏晋(特别是东晋)士人园林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出当时园林的几个特点。其一,魏晋是门阀制度鼎盛的时代,园林的主人多出身于名门大族,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建造“馆宇崇丽”。所以,研究中国的园林,自然不可忽略园林主人的身份。其二,士人园林一开始就是疏离社会的,但并不能据此就以为园林主人就是隐士。西晋石崇、东晋王羲之、纪瞻造园,主要是为现世的享受。石崇《思归引序》自述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藪,遂肥遁于河阳别业”。他晚年隐遁河阳别业,不是作隐士,而是“笃好林藪”,过放逸的生活。谢灵运优游山居是喜好山水,也不是做隐士。其三,东晋士人园林追求自然山水的天然优美,但不废人工的营造,即以大量的人工建造近于自然的景致。吴下士人为隐士戴颙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有若自然”,犹庄子所言,既雕既琢,复返自然。这一例子很能说明造园的重要原则,即人工的营造须接近自然。其四,东晋士人园林是名士审美情趣的鲜明体现,最能证明彼时的名士生活已经高度艺术化。正如有否雅量与高韵是品藻名士风流的主要标准一样,衡量园林的雅俗,当然也看园林主人的有无情趣与韵味。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十分生动地展示了名士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

大体了解秦汉的皇家园林及两晋的士人园林,然后看陶渊明的园林的特点与文化内涵,就能比较容易理解陶渊明的园田居的拔出流俗,更能清晰显示其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对后世园林的深远、巨大的影响。

二、陶渊明的园林及其文化意义

陶渊明诗文中讲到“园林”的地方仅有二处:《悲从弟仲德》诗:“阶除旷游迹,园林独余情。”《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其二:“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有时,“园林”又作“林园”。例如《答庞参军》诗:“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其实,陶渊明的园林或林园,就是他的园田居,即《归园田居》诗中所说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陶渊明的田园居并不是有意经营的园林。

传说中的周文王的灵台,就是人工营造的。秦汉皇家园林,上文言及的魏晋士人园林,都不是纯天然的不费人工的居所。而陶渊明的园林完全是普通的、平凡的农家园舍。一千六百余年后的今天,如陶渊明园田居那样的农家,在江南仍不少。当然,榆柳种在后檐,桃李植于堂前,或许也是布置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刻意的规划和营造。

陶渊明的伟大,全在于从平凡中发现了伟大。正如他从司空见惯的自然景物和农家平淡的生活场景中发现了非凡的美,并倾诉了对田园生活的无比眷恋,再上升到对于生命和宇宙的思考,从而创造了高妙的田园诗一样,他发现了自己的平凡家园,处处与污秽的世俗社会不同,将要荒芜的小径,庭中的松树,篱边的菊花,榆柳下的浓荫,北窗下的清风,都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有趣味。原来非常平凡的家园,经他的浸透感情与审美的笔墨点化,居然成为中国士人园林的极致。其中的奥妙何在?

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士人园林文化史上,全身心地热爱园林,拥抱家园,以非凡的审美情趣看待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一轩一几,陶渊明是第一人。如上文言及,石崇与众宾客常在金谷别业游宴、奏乐、赋诗,固然是愉悦的,而且也

抒发人生不永与及时行乐的情怀,但园林不过是他们享受现世欢乐的地方,也不是寄托情志的唯一场所。石崇自称五十岁之后才笃好林藪,肥遁于河阳别业。谢灵运承父祖之余荫,以巨量的资财,经营他的始宁山居,四处游目骋怀,留下不少写景佳句,例如:“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夜宿石门》)……他自诩已经是隐士了,做到了“心迹双寂寞”(《斋中读书》)。其实,谢灵运形迹虽在山川,心犹不忘魏阙。故当朝廷一旦召他,他就丢下山居,又到都城任职了。直到被杀的一刻,方才痛叹道:“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下泯。”(《临终》)可见,灵运在山居虽能“弄此石上月”,却始终做不到“岩下泯”。

陶渊明则与石崇、谢灵运等大不相同。园林是他的唯一居所,是他的生活来源,也是他得到欢乐以及日夜梦想的地方。他自幼在此读书、饮酒、弹琴、作文,园林给了他所有的欢愉。他在这里思考人生的意义。他不能离开园林,即使为生活所逼,不得不暂时离开故园,一颗心却仍留在田园。故园是他的根,真正是他的身心栖息地,也是他最后的归宿。陶渊明一百多首诗中,写到园林的不下几十首。这些情韵深厚的田园诗,蕴含着士人园林文化的许多精粹。

陶渊明的园林是现世的,世俗的,与主人的生活、劳作、休闲、养性密不可分。《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说:“果菜始复生。”《酬刘柴桑》诗说:“新葵郁北墉,佳禾养南畴。”可见,陶渊明的园林种植果蔬与庄稼,不是仅供观赏。石崇金谷园

中虽也有鱼池、水碓等治生之具,但并非是生活的唯一来源。金谷园不过是他的野外别业,是与宾客的游宴之处。纪瞻、谢安等人的园林,也是以供赏玩,并不是必须的生活资待。当然,陶渊明也在园林中招待客人,所谓“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诗其五),但那是邻里之间的真诚与温情,与石崇金谷园的待客不能相提并论。陶渊明的园林淳朴自然,可亲可近,与豪富或权贵的园林不可等同而语。

陶渊明园林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在于它的隐逸意义。在中国士人精神史上,隐逸思想或风气,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士人园林的兴起,首先与隐逸风气有关。

中国隐逸的历史十分古老。陶渊明之前的隐士,一般都是割舍妻子,告别家园,走进荒凉的山林岩穴,有的甚至不知所终。东汉中期以后,隐逸的方式开始变化。张衡的《归田赋》就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文选》李善注说:“《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张衡究竟有没有归田?可能没有。《归田赋》中描写的归田后的生活情景,其实是一种虚拟和悬想。但这并不妨碍据此可判断作者有隐逸的念头。当他于春日吟啸弋钓之后,傍晚回到蓬庐,“弹五弦之妙旨,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末了抒发“苟纵心于域外,焉知荣辱之所拘”的超世之志。^⑭张衡想象中的园林是疏离社会的,是隐士身心的栖息地。从前,传统的隐士岩居穴处,如今则隐于景色优美的野外园林了。

到了魏晋,隐逸思潮盛行,士人园林勃兴。隐逸与园林两者为正向的关系,即隐逸风气高涨,士人园林随之兴盛。园林的主人虽未必都是隐士,但园林总是疏离社会,逃避俗世之红尘,追求尘外之清旷。到了东晋,甚至出现“买山而隐”的名僧支道林。^⑮支道林买山而隐,是想求一清旷之地。但古代的著名隐士如巢父、许由,

或寝于树上,或居于岩穴,何必要买山而隐呢。从这一角度看,隐士的作风变了。名士郗超每听闻有人欲隐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⑥既然起宅如官舍,则并非茅屋一二间,而是一处比较像样的园林。

不过,如支道林的买山而隐,郗超为隐士戴逵起宅如官舍,以及谢安早先隐居东山,园林与隐逸终究很难融为一体。支道林隐了一段时间后,朝廷一征召,就到京师讲经,与当时的许多大名士广泛交往。戴逵是个“通隐”——通达的隐士,与官府常来常往。中国历史上隐士无数,只有陶渊明是个真正的隐士。也只有他,赋予士人园林真正的隐逸意义。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世称陶诗是“田园诗之祖”,那么,若称陶渊明为古代士人隐于园林的第一人,应该是符合实际的。自从陶渊明的园林出现之后,士人园林就与隐逸文化密不可分。陶渊明的园田居平淡至极,也优美至极,被后来的隐士不断吟唱,为造园家不断赞叹与仿效。即使是富豪和权贵的林园,也或多或少借鉴和仿效陶渊明园林的平淡自然,以此标榜清雅和超远。

陶渊明的园林,是隐逸的同义词。这是一个真正隐士的唯一家园,是他精神的栖息地,灵魂的最终归宿。陶渊明园林的不可企及,在于它总是作为俗世的对立物出现,前者宁静、自由、美好,后者喧嚣、欺诈、污浊。显然,陶渊明的园林与石崇金谷园、谢灵运山居等豪富或大名士的园林大不相同。诚然,金谷园位于洛阳郊外,确实是一处远离市井的清静之地,但它不过是豪富们奢华生活从市井向山水的延伸而已,并不表现出对抗现实的意味。魏末以降,名教与自然渐渐调和。石崇就主张“身名俱泰”,^⑦意思是身名二者兼美,名利双收,何必像颜回、原宪那样居贫!石崇推崇的“身名俱泰”,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人生价值观。他们一边高官厚禄,一边逍遥

山水。石崇金谷园、谢氏山居,都是把巨额的官禄,做成“身名俱泰”的标本。他们享受园林的清旷,但不会真正鄙视世俗的丑恶,更不会对抗世俗政权。岂止不对抗,甚至还要百般维护。渊明的园林不一样,它总是闪耀着对抗现实、决不与现实妥协的光辉。“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世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这些行役途中对田园的深情呼唤,足见陶渊明憎恶俗世之情。到了义熙元年(405)秋十一月,渊明辞官彭泽令,终于回归日夜梦想的田园,作《归去来辞》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视出仕为“迷途”,为“昨非”,归田为“今是”。一篇《归去来兮辞》,即是园林与现实的尖锐对立。渊明尽情赞美园林生活的宁静、自由、美好,反衬人在仕途的种种“违己交病”的拘束和难堪。相反,我们读金谷诗、兰亭诗,读谢灵运的山水诗,除了山水景色的描写与及时行乐之类的领悟之外,还能看得到坚持隐居的志向,或鄙视世俗的感情吗?似乎看不到。陶渊明的园林以隐居之志为内核,以鄙视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人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陶渊明的园林在人间,所谓“结庐在人境”是也。这既与古代隐士的岩居穴处不同,也与石崇、谢灵运等豪富建在郊外形胜之地的园林异样。石崇金谷园在野外金谷涧中,为山水形胜之处。谢灵运山居依山带江,有茂密的竹林、悬崖、瀑布,远离尘嚣。郗超为隐士戴逵筑室山中。陶渊明则隐在人境,与妻子、亲旧生活在一起,不愿意离群索居。隐在人间,却能隔绝红尘,保持内心的平静。何以能如此?《饮酒》其五一开头就

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此可知，陶渊明秉持隐在心迹，而不在形迹的哲理。尤其是“心远地自偏”之义，是对传统的隐居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从前的隐士离世绝俗，一般都走向荒野与山林。魏晋时期则出现了“大隐”“小隐”的观念，所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⑩隐在朝市的倒成了“大隐”。可见，隐逸的观念和方式开始改变了。由此推论，自然就得出隐在心迹而不在形迹的结论。渊明“结庐在人境”四句，固是高妙，但论其时代文化背景，则是名教与自然调和之后出现的隐逸新观念。既然“心远”就能“地偏”，那么，造园林于京都大邑，与筑室于山中就无甚差别了。故“心远地自偏”之义，为后世士人园林的营造及审美开了一大法门，影响深远。

陶渊明的园林，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上文已言及，陶渊明的园林不是刻意经营的产物，它平凡至极，自然至极，但美至极，趣至极，韵至极。若可一言而蔽之，则曰平淡自然。例如《时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归园田居》：“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和郭主簿》：“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荫。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止酒》：“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茝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陶诗中描写的园林景致，花药、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松竹、清荫、穷巷、荆扉、南风、松菊、庭柯……一

如江南常见的农家风物，无不平淡自然，找不到有意营造的痕迹。

然而人人眼中皆有的农家景物，经过陶渊明的点化，便显现出淳朴、淡雅、萧散、拔俗的美，成为后世园林艺术家向往和追求的典范。奥妙何在？值得细细探讨。

谈论陶渊明的园林，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现实的与写意的。现实的层次容易理解，即陶渊明的园林是客观的乡村田园，一草一木纯乎自然，并非是有意的营造或人工雕琢。渊明自己也描写过他的“贫居”景色：“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其一五），没有人工的修饰，灌木荒芜，寂寞无人迹，是渊明园林真实的本相。当主人心境荒凉的时候，那个园林也就跟着荒凉了。但在更多的时候，渊明的贫居被描绘成生机勃勃，触目所见皆有趣。这就是陶渊明园林的写意的层次。较之现实的层次，写意的层次是形而上的，是主观的、审美的。陶渊明非是一般的农人，后者甚至几代生活在祖传故宅里，终生朝夕相对平凡又单调的风景，绝少会发现田园有什么美感。陶渊明不一样，他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学识渊博，审美眼光非凡，且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气质，有远志高情。因此，他能从平淡自然中发现美、感受美、书写美。于是，他笔下的园林高度主观化、情感化、审美化。写意的园林，形成园林的意境。有意境的园林，才是艺术。陶渊明的写意园林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上文言及，东晋名士以审美眼光观察山川景物，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趣味化。喜欢走向山水，游目骋怀，这同汉末以降山水美越来越被人们认同有关。此点不赘述。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趣味化，则与生命被珍视，人情被赞美，品藻人物重情韵、重趣味有密切关系。名士们开始赏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推崇高雅与韵味，生活也就变得艺术化、趣味化。例如王子猷租人家空

屋暂住,便令手下种竹。有人问:“暂住何许烦此?”王啸咏良久,直指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⑩王子猷觉得竹子美,以至不可一日无此君,即便租人空屋住,也要种竹。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的突出例子。陶渊明的高雅情趣,加上由仕而隐的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园林的美好以及乐在其中的无穷趣味。陶诗写到园林之趣的例子不少,如《归去来兮辞》:“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小园,天天在其中走动,门又是常关的,闭塞如牢笼,无聊和寂寞,谁受得了?一般人早觉得没趣,恐怕打开门跑了。但渊明天天在园中走,自觉生出趣味。门关着,隔绝了俗世俗情,多么宁静自在。这二句抒写仕途归来之初对田园生活的热爱,鄙弃俗情的隐士情怀,以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宁静享受,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情趣与雅致。又比如《与子俨等疏》:“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春夏之交的时节转换带来的物候变化,常人多无动于中,陶渊明却欣然有喜。没有对宇宙万物的大爱,不会产生这样的喜悦。夏天北窗下凉风暂至,竟然觉得成了羲皇上人。常见的实在太平凡的景物,他觉得如此有趣,如此享受。在渊明高超的自然审美观照之下,生活中到处有感动,眼中之景都有美,后人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无不向往他笔下的园林之美,一草一木都有诗人的感情,发出理性的光辉。历代作家虽极力模拟之,但少有人能得其仿佛。原因即是陶渊明的园林是高度写意的,绝非纯客观的写真。若无陶渊明那样高超的自然审美力,高尚的个人节操,坚定的隐士情怀,以及对现实的鄙视,就决不可能创造出如他笔下的园林。苏东坡诗说:“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又说:“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眠。”^⑪确实,以为北窗下卧,清风暂时至,自谓羲皇上人,这样的雅趣,古今唯有渊明

欣然有会。故后世可以仿效陶渊明的园林意境,但永远不可能超越。

由陶渊明诗文中园林的写意,可以进而讨论陶渊明的悟道及士人园林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中国哲学中寻找答案。中华民族是很早就有理性品格的伟大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观念就已普遍存在。“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老子哲学对道的推崇,是对人世及宇宙的终极追求。《老子》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二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哲学认为,“无”与“玄”,就是“道”和“自然”,为“众妙之门”。以园林而言,山水属于形而下者之器,深藏其背后的“无”或“玄”,才是天地与自然的终极真理。游观山川景物固然快乐,然而深思并了悟深邃的道,才是终极的快乐。同样,经典的园林并不仅仅以山石、水池、花木、楼馆等有形的景致示人,而是通过景致显示某种无形的理念,让游园者得到精神的悟解,产生基于理性的满足。中国士人园林一开始就打上理性的烙印。张衡《归田赋》描写白天有关春景,傍晚回驾园林,“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之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音乐、读书、作文,皆是游观之后的精神活动,后来成为园林的基本要素。“纵心物外”二句,便是道的悟解。园林,正是忘却世间荣辱、纵心物外的所在。

东晋中期,王羲之、谢安等名士追步石崇,聚于会稽山阴兰亭,曲水流觞,然后由具象的游览转而为抽象的精神活动,众人作《兰亭》诗,多有悟道之言。例如王羲之《兰亭》诗:“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盘绿水滨。寥朗

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作者于观景之际,觉得寓目即见理:自然之伟大啊,万物无不均沾。万籁之声虽参差不齐,但于我皆有新鲜之感。晋人喜欢自然山水,亦钟情于玄思。由观景而悟道,由实而虚,由言象而至得意,正是魏晋玄学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山水自然固然令人难以忘怀,但并不是见山是山,见水即水。游目的结果是骋怀、豁情、悟道。得趣与得道,才是终极目的。

陶渊明笔下的园林之所以富有情趣与理趣,奥秘在于渊明对于天人合一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故所悟之道高妙难及,创造的园林意境超越时空的界限,无有涯际。例如《和郭主簿》诗前面多写闲居园林的种种乐事,最后四句说:“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悟出闲居田园才是真乐,何用富贵?遥望白云,油然而生怀古之情。再有《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园林的文化内涵,在这首诗里得到集中体现。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古代哲学中的根本思想——天人之际。园林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有时空的边际,但又无边际。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物我二者,相融为一。“众鸟欣有托”是外物,“吾亦爱吾庐”为自我。我知鸟之乐,且一同我之乐。由于愉悦的内心观照,万物皆呈现活泼泼的美,一片大和谐,甚至微雨与好风都联翩而来。俯仰之间,已再托宇宙之外矣。于是我们理解了,陶渊明闲居的快乐,并不局限在狭小的“方宅十余亩”,也不仅仅是眼前所见的景物,而是由实景进入无限的时空。陶渊明在他的园林中耕种、采菊、读书、饮酒,由此思玄、悟道。如此,有限的园林成为无

限,观器进至深邃的哲学境界。

陶渊明园林的哲学内涵的来源,显然同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有关。儒家有所谓“孔颜乐处”,无论穷达,都不改其乐;又有“曾点气象”,所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①。宋人钱时评论曾点说:“非实见天地万物在吾变化鼓舞中,安得有此气象。”^②朱熹评论说:“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③陶渊明辞官以后固穷守志,寝迹衡门,自得其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有人比之为孔门弟子如颜渊之徒,并非一无道理。以道家哲学而言,盖《庄子》所谓的道无所不在,流行并充满天地。眼前所见一草一木,皆有道在焉。魏晋《庄》学盛行,人们醉心于道的追寻与体悟,以致游目骋怀之际,亦“玄对山水”,即以玄思观照万物。例如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由眼前的翳然林水,就想象庄子游于濠水之上,感知鱼儿出游的快乐,遂“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④悟出“会心处不必在远”的哲理。这个故事,典型地说明晋人已十分深刻地理解了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融的道理。由此看陶渊明的“园日涉以成趣”“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北窗下卧”,是否与简文帝所言“会心处不必在远”如出一辙?

陶渊明园林的人文精神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乃是人格与气质的修炼。陶渊明闲居园林不是无所事事,不是终日成醉饱,鼓腹园中行。他把园林当作寄托隐逸之志、养我傲世品格的所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说:“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真,在道家的哲学观念中与自然同义。养真,谓修炼及爱我喜欢自然之气质。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因爱他的园林,他辞去彭泽令,回到日夜梦想的

田园。从此,园林成为他修炼爱好自然的独特气质,穷且益坚,决不再返仕途的崇高气节。《归去来兮辞》一文,可以看作他在衡茅下养真的宣言。所谓“倚南窗而寄傲”,寄傲,指寄托傲世之意,鄙视世俗社会。“抚孤松而盘桓”,以孤松独立不迁的品格象征自己。“登东皋以舒啸”,乃以啸声宣泄自己坚持隐居的情志。孟子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陶渊明在穷巷和草庐中养其隐士情怀、自由精神、绝俗之志。这是陶渊明的园林获得崇高地位的根本原因。

与陶渊明在园林中的养真以及他的审美趣味有关,菊、松、兰、鸟等几种自然物成了人格精神的象征。这里仅说两种:菊与松。陶诗说:“菊解止颓龄。”在此之前,菊的价值仅有养生之用。至于松,虽早有孔子“羨松柏之后凋”之言,但多种在墓地,不植于园林。东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人谓之“屋下陈尸”。^⑤屋下种松属于任诞行为,可见松不是什么审美物。到了陶渊明,菊松才被赋予人格意义。例如《和郭主簿》诗其二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渊明赞美松有“贞秀姿”,菊是“霜下杰”,以为隐逸之士千载以来无不抱此松菊之操,抚之而志节益坚。再有《饮酒》诗其四说:“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诗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以上诗句中的松菊,都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被赋予了坚贞、气节、操守等人格意义,渊明借以自况。从此,中国士人园林中的松、菊、兰等自然物,都具有人格色彩。

三、陶渊明对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影响

陶渊明对中国园林(甚至包括皇家园林)尤其是士人园林文化的影响无可估量。他是士人园林文化的圣人,时至今日,园林艺术家仍受到陶渊明园林的影响。他那小小的一方天地,非常

自然朴素的园林,居然能成为后世园林文化的核心内容及审美原则,始终影响后人的造园与观园,这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追溯陶渊明对园林文化的影响,最早发生在南朝梁代。庾肩吾《谢东宫赐宅启》说:“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大概梁太子萧纲赐宅给庾肩吾,肩吾称所赐之宅有五柳交垂,好像渊明之居。梁元帝萧绎《全德志》说:“虽有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⑥三径、五柳,指渊明之宅。庾信《小园赋》有“烂漫无丛之菊”“有门而常关”之句,显然也与陶渊明的园林有关。

唐代以降,随着陶渊明的声誉迅速提升,认同并仿效归隐田园的士人日益增多,其中最有名者为白居易。白爱好自然与闲情的情性与陶颇为接近,故十分仰慕陶的归隐,不论为官时还是退休后,都是尽情享受闲适。如果说,陶渊明是休闲文化的始祖,那么,白居易则是休闲文化的广大教化主,流风遗韵同样绵绵不绝。然而,初看陶、白同是休闲,其实有本质的不同。陶渊明在闲适中有时会露出傲世的脾气,虽然有酒辄饮,饮则必醉,但醉中还会说出“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饮酒》一三)这种充满智慧的话;甚至为荆轲刺秦激动,还赞美精卫填海的壮志。白居易则是为闲适而闲适,闲适之外再无其他目的。白居易慕陶效陶,但仅得陶闲适之言表,未得闲适之深意。白渭川闲居,曾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中一首写学陶渊明的饮酒云:“……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先生去已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⑦陶渊明寄酒为迹,白居易不会不理解,故称渊明“还以酒养真”;但又说渊明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显然是有意曲解渊明饮酒的深意。之所以曲解,乃是“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古今寄形于园林中

者常见,而在园林中养真者不多。养不屈权贵的风骨,寄鄙视俗世之傲气,岂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唯有“醉昏昏”,差可仿佛。白居易此诗反映出后人慕陶渊明为人之不可及,唯有仿效先贤形迹之实情。后世营造园林以标榜隐逸与清高,学到的也主要是渊明闲暇的形迹,而未得其闲暇背后鄙夷俗世的精神气质。试读白居易的闲适诗,满目皆是闲暇。诸如“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③;“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④;“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⑤;……陶渊明闲居是“虚室绝尘想”,屏弃俗念尘想,体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理趣。同时,心契古贤,栖身衡门,坚持君子固穷的高节。白居易闲居则无思无欲,昏昏默默,无是无非。这与陶渊明的闲居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白居易爱好自然的个性毕竟与陶渊明相近,且审美修养极高,与先贤平淡自然的审美经验一脉相承。《病假中南亭闲望》诗说:“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西檐竹梢上,坐见太白山。遥愧峰上云,对此尘中颜。”^⑥此似有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味道。《官舍内新凿小池》诗说:“帘下开小池,方丈深盈尺。”^⑦《过骆山人野居小池》(骆生弃官居此二十余年)诗说:“拳石苔苍翠,尺波烟杳眇。但问有意无,勿论池大小。”^⑧小池虽广仅方丈,深不过一尺,但足以让幽人自适。由小池可朝见微雨,夕见明月,也能联想到大江的连天波浪。石小如拳,而苔色苍翠,尺波亦可映出烟光杳眇,有意者观之,小景也成无限。同陶渊明“园日涉以成趣”一

样,小池、小石,可以趣味无穷。又《禁中》诗说:“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⑨《题杨隐士西亭》诗说:“静得亭上境,远谐尘外踪……旷然宜贞趣,道与心相逢。即此可遗世,何必蓬壶峰。”^⑩修心何必深山,遗世何必蓬莱,与“会心处不必在远”“心远地自偏”义理相同。所不同者在于,陶渊明爱好园林的意义是對抗俗世,白居易栖身园林是精神及艺术的享受,与现实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显然也是石崇所说的“声名俱泰”,所谓隐也不过是心隐、朝隐而已,甚至可以如东方朔所说的大隐“隐于金马门”。

宋代文人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对渊明之为人、为诗以及审美情趣,无不仰慕并仿效。宋代士人园林,很少不受陶渊明的影响,甚至包括皇家园林。^⑪影响最大者,依然是园林文化的核心——隐逸。或是仕途不得志,或是年老致仕,有一定财力者,往往造一处园林,享受闲暇,并以慕陶标榜其清旷绝俗,常常用渊明诗文中的文字题额园、堂、亭、轩、窗等建筑。常见者如归来堂、归来亭、心远亭、心远轩、陶庵、悠然阁、卧陶轩、五柳堂、醉眠亭、舒啸堂、停云堂、菊趣轩、成趣园、怡颜处等,不一而足。以渊明诗文为园林建筑题额,能起到写意的作用,营造园林的种种意境。例如欧阳修降职滁州,自称醉翁,并筑醉翁亭记之。醉翁之名,殆来自渊明喜酒,有酒期在必醉的故事。欧阳修放情山水之间,常在琅琊山与宾客同醉。萧统说渊明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欧阳修“醉能同其乐者,醒能述其文者”,其实也是寄酒为迹。王安石仿效渊明的“三径就荒”和门前五柳树,移柳穿松,作《移柳》诗说:“移柳当门何啻五,穿松作径适成三。临流遇兴还能赋,自比渊明或未惭。”^⑫道士碧虚子陈景元,赐号真靖,屡请归庐山,筑归来堂,友人杨杰为之作《归来堂赋》,其序说:“靖节远害于污俗,真靖引分于治朝,虽其去不同而所归则一,

乃追靖节遗韵,而歌归去来而贻之。”^③胡稷言致仕,在唐陆龟蒙故址上筑圃凿池,追陶靖节之遗风,作五柳堂终隐。^④晁无咎筑卧陶轩,黄庭坚为之作《卧陶轩》诗。^⑤刘子翥在潭溪筑悠然堂,作《悠然堂》诗说:“吾庐犹未完,作意创此堂。悠然见南山,高风邈相望。宾至聊共娱,无宾自徜徉。”^⑥朱熹《题郑德辉悠然堂》诗说:“高人结屋乱云边,直面群峰势接连。车马不来真避俗,簞瓢可乐便忘年。移箬绿幄成三径,回首黄尘自一川。认得渊明千古意,南山经雨更苍然。”^⑦此诗由渊明诗文点化而成。渊明门无车马喧,避俗而隐居,簞瓢可乐,君子固穷。朱熹为郑氏悠然堂题诗,表达他对陶渊明闲居园林是真隐士的见解。晁补之诗学渊明,人亦慕渊明。做官还家,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⑧辛弃疾退隐上饶,作停云堂、松菊堂。《水调歌头》(赋松菊堂)词说:“渊明最爱菊,三径也栽松。何人收拾千载,风味此山中。”^⑨南宋陶茂安,为渊明后裔,挂冠后筑园东皋,景物题名多取自渊明诗文。明文洪有《归得园二十八咏》诗,遍咏归得园中以渊明诗文题额的建筑,例如归来堂、今是亭、晨光楼、菊存坡、寄傲窗、日涉园、知还巢、盘桓处等。^⑩归得园大概是文氏的园林,从园名至各处景物,模拟陶渊明园林的意境可谓极致。

每逢历史上的易代之际,陶渊明园林的隐逸文化内核,往往会受到看重节操的遗民或文士的普遍推崇。他们退隐园林或山野,以此化解胸中郁结,对抗历史的巨大变故。这里以宋末元初的史实说明之。

宋亡之后,南方的隐士,多隐于田园或山林。全祖望《跋月泉吟社后》一文说:“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击宋季,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⑪意谓月泉吟社诸公,有渊明之气节,不仕元朝。代表人物有白珽、仇远、戴表元等隐士。元代为北方异族统治的特殊年代,汉族知识分子

断绝了仕进之途,隐逸之风大盛,陶渊明成为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卢疏斋《沈醉东风·闲居》说:“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张可久《卖花声·四时乐兴》说:“东篱潇洒,渊明归去,乐陶陶故园三径。”王寂《易足斋》诗说:“吾爱吾庐事事幽,此生事事得优游。”张翥《洞仙歌》说:“好学取,渊明赋归来,但种柳栽花,便成三径。”……咏陶学陶,高度肯定并效法陶渊明,远离社会而隐身田园,成为元代汉族知识者普遍的人生选择。

影响后世园林的还有与渊明相伴的菊、松、酒、琴。其中,以菊的影响最为深远。篇幅关系,这里仅说菊。辛弃疾以为“渊明最爱菊”,“自有渊明方有菊”。^⑫确实,陶渊明第一个赋予菊以人文意义:秋菊不畏风霜,凌寒怒放,成为高洁脱俗的人格象征。渊明之后,士人莫不爱菊,园林中也常见菊庄、菊轩、菊园等建筑,借以寄托主人的情志。例如北宋时人刘伯绍,隐居洛阳伊水边,集萃诸菊而植之,朝夕啸咏乎其侧。宋徽宗崇宁九月,刘蒙得为龙门之游,至刘氏居所,坐于舒啸堂上,玩菊花而乐之,并作《刘氏菊谱》。^⑬宋张镃《重九日病酒不饮,而园菊已芳,薄莫吟绕,亦有佳兴,因和渊明九日闲居诗一首,聊见向慕之意云》诗说:“……年年登高时,无菊酒漫倾。何如兹岁好,金英照轩荣。远怀柴桑翁,合处无疑情。不饮还醺然,妙寄由天成。”^⑭元代上饶多隐者,有郑氏移居倪阳里,种菊成庄。近取远求菊花品种,至百十余,颜色非凡。郑氏“晨兴即造之,不忧露沾裳。有时忘饥渴,餐之以为粮……花前抚鸣琴,花下列壶觞。兴至辄痛饮,饮罢卧其傍。自谓得菊趣,不知与菊忘”^⑮。元时吴兴黄庆翁,慕陶渊明,隐德不仕,栖身丘园,自号菊山。诸好友纷纷作菊山诗记其事。吴兴释元逊诗称:“东山黄处士,种菊拟渊明。绕屋秋香薄,穿林爽气清。白衣殊不至,乌帽自多情。坐石有真乐,看云餐落英。”^⑯杨基《方氏园居》诗

说：“北墅花连屋，东园菊绕庄。”^③

从南朝至明清，陶渊明对中国园林文化的影响绵绵不绝，其隐逸情志及平淡自然的审美情趣始终为后世的园林文化推崇。但隐逸情志很早就演变为闲适，栖身园林是疏离尘俗而不是对抗现实，是追求心境的自由而不必孤独在衡门。陶渊明的喜爱之物，如书、琴、酒、菊花、青松，渐渐淡化了它们的象征意义，而变成生活的情趣化与艺术化的不可或缺的点缀。后世园林更多的是继承陶渊明园林的写意特征，以陶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注释：

- ①《灵台》诗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鹄鹄。王在灵沼，于物鱼跃。虞业维枏，贡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廱。于论鼓钟，于乐辟廱。鼙鼓逢逢，蒙瞍奏公。”
- ②毛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郑玄笺：“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
- ③《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
- ④《世说新语·品藻》五七刘孝标注引。
- ⑤《太平寰宇记》卷二。
- 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晋诗》卷四。
- ⑦《嵇中散集》卷一，《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 ⑧《晋书》卷五五《潘岳传》。
- ⑨《晋书》卷六八《纪瞻传》。
- ⑩《世说新语·言语》八四刘孝标注引《遂初赋》。
- ⑪《世说新语·雅量》二八刘孝标注引《中兴书》。
- ⑫《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 ⑬《宋书》卷九三《戴颙传》。
- ⑭见《文选》卷一五《归田赋》。
- ⑮《世说新语·排调》二八：“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 ⑯《世说新语·栖逸》一五。
- ⑰《世说新语·汰侈》一〇载：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

像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⑱王康琚《反招隐》，见《文选》卷二二。

⑲见《世说新语·任诞》四六。

⑳《岁时广记》卷二。

㉑《论语·先进》。

㉒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六。

㉓朱熹《论语集注》卷六。

㉔见《世说新语·言语》六一。

㉕见《世说新语·任诞》四三。

㉖《艺文类聚》卷二一。

㉗《白氏长庆集》卷五。

㉘《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十六首，《白氏长庆集》卷五。

㉙《松斋自题》（时为翰林学士），《白氏长庆集》卷五。

㉚《隐几》，《白氏长庆集》卷六。

㉛《适意》二首之一，《白氏长庆集》卷六。

㉜㉝㉞㉟㊱㊲《白氏长庆集》卷五、卷七、卷八、卷五、卷五。

㉟吴自牧《梦粱录》卷八载德寿宫有许多名扁，其中有“松菊三径”，源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又有扁名“载忻”，源于《归去来兮辞》：“乃瞻衡宇，载欣载奔。”详见曹林娣、沈岚著《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史》第二册（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卷），第198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㊱《临川文集》卷二七。

㊲《无为集》卷一。

㊳《江南通志》卷一六八。四库全书本。

㊴详见黄庭坚《山谷集》卷四。

㊵《屏山集》卷一二。

㊶《晦庵集》卷四。

㊷《宋史》卷四四四《晁补之传》，四库全书本。

㊸《稼轩词》卷一。

㊹见《文氏五家集》，四库全书本。

㊺《鲑埼亭集》外编卷三四。

㊻见辛词《水调歌头·渊明最爱菊》、《浣溪纱·百世孤芳肯自媒》。

㊼刘蒙《刘氏菊谱》叙。四库全书本。

㊽宋张镃《南湖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㊾揭傒斯《文安集》卷二《寄题上饶郑氏菊庄》。

㊿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九。四库全书本。

㊿《御定渊鉴类函》卷三四九。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杨年保]